

林文仁◎著

派系分合與 晚清政治

以『帝后黨爭』爲
中心的探討



出版社

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

● 以『帝后黨爭』爲中心的探討

林文仁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以“帝后黨爭”爲中心的探討/
林文仁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4

ISBN 7-5004-4931-3

I. 派… II. 林… III. 宫廷—政治斗争—研究—
中国—清后期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3174 号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王应来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8.375 插 页 2

字 数 461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韋慶遠

林文仁君在其新著《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1885—1898）》出版之前，囑我爲其作序。1992年，我作爲大陸第一批歷史學者訪問團的成員，首次訪問臺灣，在海峽兩岸清史學術討論會上，認識了林文仁君。那時林文仁君正在攻讀碩士學位，參加學術討論會也僅僅爲旁聽者。然林文仁君低頭筆記，寧坐仁聽而與討論會相始終，已經引起我的注意，而會後在其導師林能士先生帶領下，前來下榻造訪，得知其研究方向和關注的研究課題。是時正是拙書《清末憲政史》（與高放、劉文源合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脫稿之際，故言此時期頗詳，不意林文仁君居然下定恒心，努力研究這個時期的問題，在我以後幾次訪問臺灣時，其曾經多次與我相談，而終林文仁君以此課題獲得臺灣政治大學博士，可喜可賀。

在中國歷史上，“派系”之爭和“朋黨”政治作爲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的派生物而長期存在，而瞭解“派系”、“朋黨”則能够深入研究政治史，理解政治制度的變化和運行，同時也可以瞭解社會的變化規律以及發展趨勢，在基於歷史的客觀存在的情況下，較爲公正敘述和評價“派系”和“朋黨”的同時，進而給社會提供某種啓示，乃是歷史學家的責任。

同光時期的社會正處於空前的大動盪之中，外則列強干擾進逼，瓜分侵奪之心昭著；內則兵變、民變、抗捐、抗糧等風潮迭起。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政局也出現明顯的變化；在全國，地方勢力與中央相抗衡的格局已見端倪；在朝廷，“恭醇之爭”已

經使滿族親貴離心離德，“南北之爭”則使漢族官僚參與了決策；在君主，慈禧太后雖然獨操大權，但女主當政的名不正的陰影猶在，而年紀漸長的光緒皇帝也有取代其權力的趨勢。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場關係政治權力掌控及轉變的鬥爭，已經在嗜權者之間展開，參與或被卷入政治鬥爭的各種派別，都力圖謀取主動，試圖有效地控制政治局面，以獲取更大的政治權力。

光緒六年（1880），慈禧曾經派太監給母家送物，被神武門禁兵攔阻，慈禧氣憤不過，下令將當值護軍斬首，而奕訢却率同衆臣反對，時尚未獨攬大權的慈禧，也只有忍氣吞聲。光緒七年（1881），慈安太后去世，慈禧可以獨攬大權，在權力排他的作用下，容不得掣肘，而“擁戴”有功的恭親王奕訢“功高震主”，勢必成為慈禧大權獨攬的障礙；權力必有人協助實施，抑此扶彼，以使自己的權力暢行無阻，則是慈禧達到獨攬大權的必要手段。師出有名，在有“正名”的傳統社會裏，抑此扶彼總是要尋求理由。於是借奕訢辦理中法越南問題交涉乖方，罷黜奕訢爲首的全部軍機處人馬，奕訢開去一切差使，“家居養病”，起用光緒皇帝的生父奕譞。在表面上看是“倒恭用醇”，實際是慈禧太后在操作政柄。

恭親王奕訢倒臺，慈禧太后垂簾聽政，正值國家多事之秋，內憂外患，邊境危機，而慈禧支持左宗棠鎮壓陝甘回民軍，收復新疆；任命曾紀澤爲專使，改訂原欽差大臣崇厚與俄國簽訂的《裏瓦幾內條約》，收回伊犁；派遣專使去古巴、秘魯交涉受虐待迫害華工之事；成立總理海軍事務衙門，開展近代海防建設；新疆、臺灣建省，中法戰爭獲勝等所謂軍事、外交的勝利，爲慈禧太后贏得聲譽，但慈禧執政的合法性却在光緒皇帝年近成人時出現危機。

光緒十三年（1887），光緒帝已經17歲，按當時的認識是成人了，所以慈禧便宣佈明年“歸政”於光緒。與其說“歸政”，

毋寧說是試探群臣。光緒皇帝的生父醇親王奕譞深明此道，於是吁請慈禧太後繼續聽政，而朝臣中提“親政”者有之，提“訓政”者有之，提“暫緩歸政”者有之，提“歸政”者有之。各種各樣的頭面人物，提出自己的看法，打出自己的旗幟，展開各種活動，都希望能够在政局中占主要地位，而權力的角逐產生各種政治人物，政治旋渦此起彼起。慈禧聽政到歸政，再到訓政；光緒帝從親政到失政，再到幽禁瀛臺；軍機魁首在奕譞去世之後，雖仍為親貴掌握，漢族大臣已經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帝、后之爭中，各種派系合而又分，分而複合，互相利用，互相傾軋，鬥爭是空前激烈和殘酷的；不但具有微妙的個人恩怨，而且有着鮮明的政治內涵，時而巧施謀略，時而貌和神離，各種類型的人物競相表現，使用各種陰謀權術，並通過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政策、活動中表現出來。因此，具體分析該時期的派系，就成為分析當時政治局勢的重要方面。本書就政治運作而分析“帝后黨爭”，以權力角逐與妥協來分析各種政治派系，以政治經濟利益的攘奪與交換來剖析各種政治派系的實質，具體而生動地描畫出晚清各派系的面貌，試圖重現當時盤根錯節、錯綜複雜的鬥爭場景，觀點新穎，資料扎實，頗有創見。

林文仁君多年從事晚清政治史研究，腳踏實地，學習刻苦而不善張揚。本人曾經多次去臺灣，與林文仁君有一定交誼，也曾經讀過他一些頗有見地的論文，聽過他在學術會議上的報告，這本《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1885—1898）》則是其多年潛心鑽研的成果。此書雖然以1885—1898的歷史為主綫來分析晚清政治派系，但依據大量史實，就各種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展開層層研究，將政治風雲變幻無常，各種社會矛盾復雜的晚清政局，栩栩如生地鋪述出來，顯示作者雄厚的史學和文學功底。

林文仁君師從政治大學林能士教授，獲得歷史學博士。我與林能士教授和林文仁君都很熟識，今囑為序，實不能推辭。今

能够先讀其稿，領略他們師生的研究風格，亦是一快事。“書山有路勤爲徑，學海無涯苦做舟”。相信林文仁君會因爲此書出版爲研究起始，繼續進行研究，取得更多的成就。僅以此爲序，並示祝願。

2004 年 11 月 21 日於師鑿堂

目次

序	(1)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中法戰爭後的朝局變動 (1885—1894)	(28)
第一節 中法戰爭前的派系結構	(29)
第二節 帝后關係的變化	(43)
第三節 南北派系及其發展	(71)
第四節 淮系北洋的新挑戰	(115)
第三章 中日甲午戰爭期間的派系角力 (1894—1895)	(137)
第一節 韓事初起時的派系交鋒	(139)
第二節 戰爭期間的派系惡鬥	(167)
第三節 謀和過程中的派系拉鋸	(211)
第四節 淮系北洋控制權的終結	(270)
第四章 派系結構的調整與對立 (1895—1898)	(300)
第一節 帝后兩黨的人事變動與對北洋的競逐	(300)
第二節 軍事調整中的派系角力	(327)
第三節 翁、李在外交決策上的爭鬥	(352)
第五章 帝黨瓦解與派系格局之翻覆 (1898)	(393)
第一節 帝黨對維新勢力的拉攏與內部變化	(394)
第二節 帝后兩黨之人事昇沉	(423)
第三節 由維新走向政變的最後掙扎	(440)
第六章 結論	(502)
參考書目	(513)
附錄一 重要人名稱謂對照表	(529)

附錄二	光緒朝 1885—1898 年間帝后兩黨基本 結構表.....	(532)
附錄三	“官常”與“權力”的語言考察 ——以《翁同龢日記》為例.....	(533)
後記		(579)

第一章 緒 論

一、研究動機

中國近代史研究，自 20 世紀前半期，以外交史領域為濫觴，而上昇至學術位階以降，歷經一世紀中外史學界之努力，研究的各個面向皆呈現豐富之成果；世紀末期，甚且因如後殖民理論（post-colonialism）等文化研究路徑之滲入，而展現另一層面之思考形貌。其中，政治史研究之成績，於比例上誠稱盛於各領域。然而，政治史研究成果雖較豐碩，有關政治派系論述所占之篇幅卻甚少，似乎反映了派系問題在中國近代政治史研究上受到忽略。^① 但翻開有清一代豐沛之私家日記、筆記等史料，最常聞見之內容，又非派系問題之相關載記莫屬。這說明了時人對此類問題之觀察熱忱與敏感。因此，有關派系問題在整個中國近代政治發展中所產生之作用，如不能有充分之辨析，便不能不說是極大之缺憾。至少，派系問題研究上的不足，就無法構成一部完整的中國近代政治史。

在君主專制政體下，君主作為最高的權力與資源分配者，往往並不被置入派系理解的成分之中。然而，就實際政治運作而

① 就以史學界所熟悉，山根幸夫主編之《中國史研究入門》為例，在該書近代（I）部分所列舉之晚清研究成果中，即令涉及政治史範疇的著作，亦絕少以派系問題為討論核心。縱使所列著作中，有極少數實以派系互動為討論重點，在該書之簡介文字中，亦幾乎不觸及此義。此或許一定程度反映從派系鬥爭等較綿密之角度，理解近代政治史之路徑的缺乏。參見山根幸夫主編，田人隆、黃正建等譯：《中國史研究入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 1 月，二版），下冊，頁 928—1033。

言，卻未必如此，尤其當最高統治者在名與實之間出現擺蕩，甚至落差時，表現得更為明顯。一種對己身地位與權力之合法性缺乏確定性的疑慮，往往令原應獨踞峰巔之人主，亦不自覺地成為派系中之一員。就中國政治史而論，本文所將討論之晚清光緒朝“帝后黨爭”，即一鮮明例證，此更添晚清派系研究之必要性。

質諸古今中外，權力的徵逐與妥協，利益的攘奪與交換，幾乎成為一般人對“派系”一詞的共同印象。就某種程度而言，這也是事實。然而，“黨”或“派”在政治史運作中近乎亦步亦趨的存在，卻也提醒我們派系互動在繁複的政治活動中，亦有其積極功能。不應忽略的是：派系間之妥協與整合，其實正是決策行為的本質。透過尋求最大公因數的過程，將理念或構想轉成具體政策。落差或在所難免，但正常情況下，總是反映一定程度的進展。然而，當權力欲望與謀國忠誠間產生失衡現象時，派系藉內外決策，陰行鬥爭，不惜出賣君臣倫理，甚至犧牲國家利益的作為，往往便難可自抑；而如此現象，又每見於朝局面臨重大轉變，或承受外來壓力之際。蓋危局處理，往往造成部分權力資源的釋放，容易牽動權力版圖之變動，且適足鼓勵派系間之對抗與爭奪。因果相循，愈趨極端，最終唯訴諸一場“零和”對決，以重建秩序。此中實少意識形態糾葛，只有實力與生存之較量。“黨爭”云云，此謂是也。本文所將論列者，毋寧即一典型。

當本文將 1885—1898 年之歷史進程，置諸派系脈絡下來觀察時，讀者不難發現很多我人自以為瞭解或已蓋棺論定的人或事，可能變得很不一樣。這未必表示派系之爭是解釋此段史事之唯一路徑，但卻可能反映過往的認知方式，存在缺乏更深地掌握史事間之延續性的弱點。如對戊戌變法相關問題的理解，即是一例。這亦使得本文的撰作，可能因而更具意義些。但更有意義的，該是透過這些討論內容，讓我們體認到許多輕率地被認定“結案”的中國近代史課題，仍以其待發現之豐富內涵，質疑我人之判斷，

或至少是警醒研究者持續深化思考的誠意。就筆者而言，此或為最主要之研究動機。

二、本文架構

同治與光緒前期（1884 年之前）派系分合之樣貌，及其與諸內外事件之連結，已有一定之研究成果呈現，以明所以。^① 由此中歸納，光緒十年（1884）“甲申易樞”前之權力面目，^②或可以“恭醇之爭”與“南北之爭”二線相名之。“恭醇之爭”乃滿洲親貴於“辛酉政變”權力重組後所生之競爭格局；^③而“南北之爭”則為太平軍之役後，於漢官僚體系——尤以中央決策之軍機為甚——成形之路線對抗。^④二者甚囂塵上，亦反映自 1860 年代後，專制君主權力操作方式之變化。派系不再盡仰於上而苟存，柄權者正須賴派系之分合互動而尋找其更大之有利空間。即此，則無論實居權力巔峰者為何，已不能不放下身段，以各種可能方式運用，甚且介入群臣派系矛盾內，創造最大之可能空間。如是，則居上者已不能超然懸持矣。光緒十年（1884）後之派系格局，於焉現其

① 較常被提及之成果，殆包括吳相湘：《晚清宮廷實紀》（臺北：正中書局，1988 年 8 月，新版），及查時傑：《清光緒朝前期的幾個政治集團》，收入《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一期（1974 年 5 月），頁 19—45。此外，吳氏尚有收於其所著《晚清宮廷與人物》（臺北：文星書店，1967 年，三版），及《近代史事論叢》（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4 年 8 月，初版）中之部分相關論述，亦稱佳作。

② “甲申易樞”事在光緒十年（1884）四月，慈禧借中法越南衝突所昇高之長期派系對立蘊積，一罷以恭親王奕訢為首之全班軍機，替以醇王系人馬。其事之密與規模之大，宛如慈禧自“辛酉政變”（1861）後，又一次政變之舉。詳見拙撰：《南北之爭與晚清政局（1861—1884）——以軍機處漢大臣為核心的探討》（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民國 86 年 5 月），頁 138—158。

③ 參見查時傑：《清光緒朝前期的幾個政治集團》，《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一期，頁 19—45。

④ 拙撰：《南北之爭與晚清政局（1861—1884）——以軍機處漢大臣為核心的探討》，頁 35—57。

輪廓。

循前述線索，本文之第二章《中法戰爭後的朝局變動（1885—1894）》，將於基本介紹自辛酉（1861）至甲申（1884）之派系運作概貌後，導入對光緒十一年（1885）起，在新政治環境下，派系格局變動之討論。透過本章之鋪陳，我們將呈現一個以“帝（德宗）后（慈禧）黨爭”為核心，並圍繞以各項新起舊續之派系互動的網絡。

大體而言，中法越南衝突的效應，最終引爆了清廷內部權力結構的巨大變動，^①“倒恭用醇”路線之成真，使過去十七餘年來，^②基本以滿——“恭醇之爭”與漢——“南北之爭”為主線之派系鬥爭，告一段落。醇王一系之出掌樞垣，其實也代表了長期隱身於醇王之後，令易於掌控之醇王對恭王進行“代理人戰爭”的慈禧太后之勝利。盡管醇王意志、才具皆難及乃兄奕訢，但以恭王既倒，人心浮動之際，正須仗醇王之威望，加以安撫，進而行派系之收編，其中尤以李鴻章之淮系北洋最具代表性。此後，“海軍衙門”與北洋海軍之建立，更為醇、李合作之具體表徵。

然而，隨著由慈禧當年說服慈安太后支持指名，而入承大統的光緒皇帝日近成人，慈禧柄政地位之合法性勢將面臨挑戰；而光緒欲求他日於鞏固權力格局時具更大之主動性，勢須壯大親附於己之官僚勢力。於此，時為帝師，且為南派魁首之翁同龢，便扮演形同執行者之角色，以其文衡宗師之地位，大舉掄拔少壯派

① 見拙撰：《南北之爭與晚清政局（1861—1884）——以軍機處漢大臣為核心的探討》，頁155—158。

② 此云“十七年”，乃自同治六年（1867），沈桂芬入樞後算起。南北派系鼎立之勢，乃成於同治四年（1865）李鴻藻及同治六年（1867）沈桂芬行走軍機，各成本派魁首也。本文勉以此據，特略說明。

官僚。^①此既為德宗培植一批忠君新銳，亦藉以厚實南派隊伍，使甲申易樞時，與李鴻藻所領北派同受蹶頓之勢，一時刷新，甚且因德宗親政日近，而水漲船高。

相較於此，北派持續低迷，難堪相埒，這便使得漢官僚派系間之權力競逐主線，漸移向翁之南派，與長期控扼封疆要津利源之李鴻章淮系北洋二者間。南派與淮系北洋之權力爭鬥，一定程度助長帝后間久已存在之矛盾與緊張，似亦必然。由“帝—后”與“翁—李”滿漢兩條派系對抗，或隱或顯而現，遂帶動其餘派系資源漸投於帝后權力矛盾之下，而成日後“帝后黨爭”之基本陣勢。溯觀各派系間互動整合之脈絡，則光緒二十年（1894）至二十一年（1895）中日朝鮮戰後之發展，誠一關鍵時期。透過韓事期間，各派系間之分合昇沉，以帝后對立為核心之權力格局愈見清晰。是以，本文第三章“中日甲午戰爭期間的派系角力（1894—1895）”，將詳述前此之派系矛盾，如何以此後之論和論戰為舞臺，進行著慘烈詭譎不下於戰場廝殺之權鬥。

甲午燬師，淮系海、陸主力幾皆瓦解，此誠李氏最終被迫黯然放手久踞北洋要津之一大關鍵。其間，德宗與南派之近於逼戰，及慈禧與其近臣，乃至北派對李鴻章之迴護，^②益反映外患

① 計翁氏從政生涯中，曾五典鄉試，兩典會試，並數任覆試、殿試之讀卷大臣。翁與考差雖未必為正主考，但闡中衡文之事，幾皆依翁氏為決。尤其光緒十一年（1885）、光緒十四年（1888）、光緒十九年（1893），翁氏三典順天鄉試，北闈向集各省官卷，水平、出身非他闈可比，於翁拔擢、吸收人才，更見有利。

② 觀察此期間翁同龢日記所載，可發現不少例證，即令淮系動靜皆失，一敗塗地，言路沸揚之際，慈禧與其派下迴護仍多。李氏幕僚吳汝綸於平壤初敗之際，亦有與友人函言：“……朝中不信李相，頗有意摧折之，幸太后尚倚重爾。然軍事棘手，君臣之間，亦在危疑”等語。相關問題可參閱石泉：《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11月，一版），頁148—162，或林能士：《中日甲午戰爭與清末北洋控制權的轉移》（臺北：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論文，1999年7月），頁76—88。

壓境之際，內煎不過之實況。惟李合肥畢竟黯然而去矣，經李氏二十五年經營已成影響政局發展重鎮之北洋，^①及取代淮軍，而為國防倚重之核心武力再造，遂成此下派系競逐，以厚實力之重點。其次，自韓事後，德宗着意整飭原決策核心團隊，不少久居樞垣而向被目為后黨成員之重臣，被迫下崗，^②遂令軍機與總理衙門中，南派陣營得具一定之相對優勢；^③但亦於此期間，中俄密約，與英相莎侯（Lord Salisbury）所稱之“中國租讓權爭奪戰”（the battle of concessions in China）連串爆發，帶出瓜分危機之先聲，亦令主其事之德宗與翁同龢承受極大壓力。究其所以，此中事態發展，仍籠罩派系鬥爭之陰影，尤以奉旨行走總署，而得操弄其龐大外交人脈資源之李鴻章，與翁同龢之交手，最見暗潮洶湧。^④凡此，皆成帝后兩黨及所附各派系盤整實力，積極為人事布局，以俟權力衝撞高峰來臨之此段時期中，深具後

① 李氏自同治九年八月初三日（1870年8月29），以湖廣總督本職奉調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至光緒二十一年七月初九日（1895年8月28）奉旨留京人閣辦事，交卸北洋之任止，正好二十五年。其間只於光緒八年（1882）三月，至九年（1883）六月，因丁憂離津，餘皆實控。

② 由韓事期間算起，除李鴻章痛失北洋重鎮外，中樞之整頓持續進行，包括光緒二十年（1894）十月，額勒和布、張之萬罷出軍機，翁同龢、李鴻藻、剛毅入直；十一月，恭王入直領樞；光緒二十一年（1895）六月，於和議成後，長期被視為慈禧意志之代理人的孫毓汶、徐用儀先後罷直軍機、總署，代以錢應溥之舉，則更見整肅之意。

③ 就以軍機及總署人事變化後的光緒二十二年（1896）至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變前來看，恭親王奕訢與禮親王世鐸決策參與甚消極，李鴻藻越年而逝，翁氏在德宗器重下，形同樞垣之首，剛毅乃翁氏所薦，此時兩人關係尚未發生變化，而錢應溥亦翁氏所援引。再就總署來看，光緒二十二（1896）到二十四年（1898）戊戌事前，進罷之間，至少十人左右，大抵滿、漢各五人，漢員五人中，翁氏與親翁之張蔭桓、廖壽恒即占三席，加以滿臣常不到署，外交談判、決策權，翁氏便成核心矣。

④ 李鴻章自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內召後，只餘其文華殿大學士之職，至光緒二十二年（1896）九月，方奉旨行走總署。

續影響之事件。本文第四章“派系結構的調整與對立（1895—1898）”即以甲午後至戊戌前，各派系於韓事後對所發展出新權力影響因素之競逐，及由此而呈現之歷史面貌為重點，將原分屬軍事史——如軍制改革與新國防武力之整編、建立，或外交史——如中俄密約與租讓權爭奪戰之擴大等，納諸派系因素之線索下來觀察，庶幾由另一角度充實對此時期史事之理解外，亦能為派系鬥爭終由甲午走向戊戌，嘗試找出更緊密之有機聯繫。

自光緒二十二年（1896）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間，連串外交處境惡化之打擊，固令有識之士深悚於國勢危脆，淪喪在睫；基本控制外交決策系統之南派，更於因應事件之經歷中，深體派系勢力之掣肘，與自身缺乏全面執政實力之現實。此非但為翁同龢與南派之困境，更是無法擺脫慈禧與后黨牽制之德宗最大憂患。職是之故，無論就挽救瀕於危亡的朝廷，抑或突破現實之權力窘境，有效壓制敵對派系之鬥爭實力，都需要一場進一步強化德宗與南派執政合法性之政治興革。光緒二十四年（1898）的維新運動，就派系之爭的角度觀察，便是在此種形同帝黨與南派最後一搏的情況下，被寫入了歷史；而事態的發展，最終也的確令這場中國專制王朝史上，最具挑戰性與改造規模的體制變革大戲，成了晚清同、光兩朝派系鬥爭史上，另一個階段性的轉折點。本文第五章“帝黨瓦解與派系格局之翻覆”即以前述線索，為自光緒十一年（1885）以降，派系之種種分合重整鬥爭，作一階段性結果之分析。此中固涉及戊戌新政之軌跡，然非與派系之爭具密切關連之部分，本文將不多作討論，倒是歷來甚具爭議之翁同龢見罷與戊戌政變爆發因由之所以，本文將在所劃定之主線下，就前此學界之研究結果與爭議，加以辨析。筆者或不敢言可突出新見，但求一現無論說法為何，根本都繫於全文所欲提醒思考之發展核心——派系分合——之實質。

三、相關研究成果

循着光緒十一年（1885）至二十四年（1898）的時間帶，本文將走過的重大事件，至少包括如中日甲午戰爭及馬關條約、中俄密約、瓜分危機，及戊戌變法等議題，歷年來，有關上述各主題之研究成果，即令非謂汗牛充棟，總可名之曰可觀。唯以本文之討論核心，在“派系”一端，因此，以下擇要介紹之研究成果及具代表性之研究學人，亦以彼等在此一議題上之表現為標的。

談到對晚清官僚派系研究具有一定貢獻的學者，其實是一份不算長的名單。但無論這份名單如何短，排在最前列者，必推吳相湘及沈雲龍兩位。吳、張二位資深史學工作者，無論個人著作，或參與編輯之史料叢刊，在數量上，都足令後輩學人為之肅然。尤其沈氏長期主編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續編，^①更是所有研究中國近代史——包括派系領域在內——最重要的一項基本史料寶庫。相較於其個人著作，這部分成就或許更有效地為沈氏建立了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永久影響。當然，這絕不代表沈氏無相對亦稱重要的個人專著或文集傳世，以與派系研究相關者而論，《康有為評傳》與《近代政治人物論叢》，^②便是為後學所熟悉的兩部重要入門書。沈氏的著作風格，頗為傳統，文字雄渾有力，強調興衰議論，都與中國史學路徑相映，加上現代學術要求下相對嚴謹之史料徵引，更添其作品之吸引力。也許有不少年輕一輩學人或讀者，已不甚習於如沈氏一代學者討論問題的方式，而更傾向於在史料排列下，將自身成果弄得如同一道化學方程

① 沈氏此項堪稱其平生最重大之工作成績，已成中外研治近代中國史之寶庫，在正續篇各一百輯，逾二千三百冊之集編中，所有私家筆記及史料匯編，幾無不包，1980年代又有三編面世，現仍出版中。

② 沈雲龍：《康有為評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7年7月，再版）；沈雲龍《近代政治人物論叢》（臺北：自由太平洋出版社，1965年6月，初版）。